专题讨论：未来十年的中国、亚洲和世界

亚洲正在出现的中印美战略三角

[印] 拉贾·莫汉（C. Raja Mohan）

如果说中国的显著崛起——我们时代最重要的地缘政治现象——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政策制定者的关注，那么亚洲和其他地区的其他国家诸如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巴西的兴起，则使关于未来国际体系的讨论变得更加复杂。本文试图评估，新德里相对地位的日趋提升将如何影响其与北京和华盛顿的双边关系，并在崛起的中国、新兴的印度和衰落的美国之间创造出一种三角动力。尽管印度的兴起不如中国那般显著，却足以影响许多亚洲次地区的地缘政治和大国关系，甚至令国际关系体系发生转变。中印两国不可避免的崛起将从许多方面改变世界，这种观点早就存在；然而，在本世纪最初十年的末尾发生的、震撼世界的金融危机之后，对这两个新兴国家成长为大国的规模、速度和影响的认知变得更加真切。西方尤其是欧洲和日本经济发展的放缓，俄罗斯相对实力的持续衰减，意味着中国和印度将比预期更快地赶超最发达的经济体。2010年，中国赶超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有望于2020年在经济总量上超过美国；印度则被认为会在接下来的数十年中成为第三大经济体，并于本世纪中期赶超中国和美国。[1]

本文不关心上述预期的趋势是否会成为现实。然而，可以确定的是，随着两国经济地位的提升，两国可以把更多的资源投入军事现代化，加强硬实力。中印两国的软实力资源也会稳步增强，促进各自在外交和文化上的影响。与此同时，其规模庞大的十余亿人口和扩展的经济分量将对从能源、环境，资源安全到区域制度以及全球治理等一系列议

随着两国经济地位的提升，两国可以把更多的资源投入军事现代化，加强硬实力。

[印] 拉贾·莫汉（C. Raja Mohan） 新德里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1 Willem Buiter and Ebrahim Rahbari, *Global Growth Generators: Moving Beyond Emerging Markets and BRIC*, New York: Citibank, February 2011.

题产生极大的体系性的影响。基于中印两国自己持有的例外论（exceptionalism）和对“天定命运”（“manifest destiny”）的强烈信念，世界已经感觉到，这两个国家有着超乎所需的政治意志去成为大国，进而塑造本世纪的世界政治。中印两国将如何改变世界取决于若干问题的答案，其中一个就是：中印两国对其权力的增长赋以何种目的。它们的政策会像19世纪的英法两国一样吗？抑或看起来更像20世纪的美国和苏联？又或者中国和印度是与众不同的大国？本文还将关注另外两个因素：其一，这两个亚洲大国彼此之间将建立起何种性质的关系；其二，它们将与西方建立怎样的关系。简言之，本文思考以下两个问题：中印两国将成为伙伴还是竞争对手？凸显于北京、华盛顿和新德里之间的三角动力学将走向何方？

一、中印关系的悖论

早在印度（1947）和中国（1949）各自成为现代国家之前，两国的民族运动及其思想领袖就已彼此联系，并且寻求持续合作的基础。作为摆脱殖民主义的伟大的文明古国，中国和印度的民族主义者深信其背负着重塑亚洲和世界的命运。这是理解尼赫鲁1927年于布鲁塞尔召开的世界被压迫民族代表大会（The Congress of Oppressed Nationalities）上会见中国代表的关键。随后，在抵制日本对华占领的过程中，印度民族运动表达了其与中国人民的团结。然而，被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中印民族解放运动发现，双方无法实现合作。大国冲突的结构，以及印中两国各自面对着不同的帝国主义国家这一事实，阻碍了这两个民族运动之间实质性的政治合作。[1] 1940年代，当日本进一步向南亚次大陆进军，英国要蒋介石访问印度，请求印度民族主义者停止与伦敦的对抗，把精力集中在对抗东京的战争上。印度的领袖们，包括甘地在内，对此表示了拒绝。在思想层面上亦是如此，尽管都在与西方新的统治做斗争，推动中印两国行动的大的理念往往不相配合；它们在关键的政治和哲学思想前提上也不一致。[2]

在宣布取得独立之后的早期阶段，印中两国再度为政治合作做出新的努力。两国关系中的浪漫主义以1950年代“印度、中国，亲如兄弟”（“Hindi-Chini Bhai-Bhai”）的口号为标志。然而，到1950年代后期，两国关系因西藏动乱和未解决的边界争端而开始恶化，并在1962年底的短暂军事冲突中达到顶峰。这持续地影响着两国关系，直到1980年代双边关系的正常化。一直到冷战的最后阶段，印度和中国都处于对立的两边。中国共产党在与苏联共产党分裂之后走近

1 对殖民时期中印关系的回顾，参见 Madhavi Thampi, ed., *India and China in the Colonial World*, New Delhi: Social Science Press, 2005。

2 Guido Samarani, *Shaping the Future of Asia: Chiang Kai-shek, Nehru and China-India Relations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Period*, Lund: Lund University, 2005.

美国，而民主的印度却向苏联共产党敞开了怀抱。虽然主导两国关系的是边境冲突，中国和印度还发现：两国的世界观极为不同，在东南亚和南亚地区有着互相冲突的利益；关于亚洲和印度洋未来的安全秩序，双方的争议也很大。无怪乎20世纪的中印关系被描绘成无止境的角逐。[1]

在世纪之交，中印关系似乎步入了有史以来最好的阶段。20世纪最后几年的正常化努力似乎收获了成果，两国的双边贸易从1998年区区10亿美元，骤然跃升至2010年近600亿美元。如果参考以往的趋势，两国领导人为2015年设定的1000亿美元目标很可能提前实现。作为保持高层接触和扩展人员往来的补充，中印两国还为建立军事互信和重要边界争议的政治解决做出了努力。随着双边关系达到新的深度，“Chindia”这种说法开始广为流行。[2] 然而，以往的对抗也在21世纪最初十年的末尾再度出现：在两国争议的边界上出现了军事紧张；针对对方国家质疑本国的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的态度，双方都表达了深切关注。倘若北京担心印度在西藏问题上的态度，新德里也有理由抱怨中国在查谟—克什米尔（Jammu-Kashmir）问题上对印度主权的态度。贸易的拓展也导致了新议题的兴起，例如目前一边倒向中国的贸易失衡。此外，两国关系中还充斥着对彼此与第三方（如巴基斯坦和美国）的关系的猜疑。[3]

二、中印竞争的缓和

在一些人看来，中印之间的竞争植根于无情的地缘逻辑。由于共存于同一个亚洲的中印两国都在寻求扩大对邻国的影响，一场在中亚、南亚和东南亚的影响力之争便无从避免。竞争并不局限于陆上空间，还扩展到印度洋和西太平洋：由于中印两国在贸易上的新关注，对海上交通要道的保护也随之展开。两国的竞争也不局限于周边地区。当北京和新德里你争我赶地在远离国土的海外寻求关键的自然资源（能源和矿产）时，这一竞争便在自远东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到拉丁美洲的哥伦比亚，南太平洋以及非洲地区等遥远地区展现出来。世纪之交，当两国加强双边合作时，中印双方都试图弱化互相竞争的前景。它们不断地宣称，不会对对方造成威胁。双方也坚称，世界上有足够的空间同时满足中国和印度和平崛起的需要，而且两国的合作将会对亚洲世纪的兴起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所有这

1 对双边关系的详尽回顾，参见 John W. Garver, *Protracted Contest: Sino-Indian Rivalry in the 20th Century*, 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2 Peter Engardio, ed., *Chindia*, New York: McGraw Hill, 2007.

3 P.R. Chari, "China at 60: Sino-Indian Tensions", Occasional Paper, New Delhi: Institute of Peace and Conflict Studies, October 26 2009; see also Neville Maxwell, "Renewed Tension on Sino-Indian Border: Who is to Blame", September 3, 2009, available at http://www.eastasiaforum.org/2009/09/03/renewed-tension-on-the-india-china-border-whos-to-blame/, accessed on April 1, 2011.

些正式的立场声明和深化的双边经济关联表明，中印都越来越关注对方在两国共同的周边地区日渐增多的足迹和不断扩大的影响。担心中国通过与印度的邻国建立起特殊关系而将其拘困于次大陆之内，新德里这一传统的恐惧在21世纪未减反增。过去印度关注中国与巴基斯坦的战略伙伴关系，如今已经拓展到北京与尼泊尔、不丹、孟加拉国、缅甸和斯里兰卡的关系。与此相类，从前中国担心印度在其历史上视之为后院的印支地区的影响，现在北京则警惕着后者将其海洋活动扩展到南中国海，并深化其与关键的东盟国家之间的安全关系。对彼此的崛起“两面下注”时，北京和新德里发现，两国的双边关系对它们各自与其他主要国家的关系越来越敏感。双方都在利用本国与美国、日本和俄罗斯的关系来获取相对于对方国家的优势。

从前中国担心印度在其历史上视之为后院的印支地区的影响，现在北京则警惕着后者将其海洋活动扩展到南中国海，并深化其与关键的东盟国家之间的安全关系。

于是，对由另一方组织的敌对战略联盟的恐惧都在两国首都扎根，并为国际关系理论家所谓的“安全困境”奠定基础。[1] 那些一国认为保护自身利益所采取的必要措施被另一国视做削弱其地位的侵略之举。由于安全困境，彼此猜疑的两国置身于一场空前升温的竞争中，双方的安全都会被削弱。中印竞争这个说法并不新鲜；然而，一些新的因素使当代举足轻重的中印竞争不同以往。当前，崛起的中国和新兴的印度在大国中名列前茅，具备更强大的权力，拥有广泛分布的利益，在强烈的民族主义冲动的驱动下将国内政治合法性的赌注押在维持高增长率之上；而高增长率的维持，则有赖于两国在相互联系日趋强化的世界舞台上实现外部目标的能力。中印两国反复发现彼此在重塑地区和国际制度上的矛盾。印度对中国在南亚区域合作联盟（South Asian Association for Regional Cooperation）中扩大影响怀有戒心；北京方面则试图限制印度在东亚地区制度事务上扮演的角色。在全球核事务变革和联合国安理会改革问题上，新德里和北京也互相冲突。世界在密切关注着两个正在崛起的亚洲巨人之间的竞争；倘若它以战争或冲突的形式告结，中国和印度便注定要被削弱。尽管由北京与新德里组成的“东方大联盟”这一说法颇为牵强，中印两国能否对发生在其共同的周边地区乃至更广阔的国际体系中的竞争进行有效管控，使其维持在有限而和平的范围之内，仍然是个大问题。

60年前，当作为现代自由共和国的中国和印度再次与世界联系起来，它们面对着来自西方国家支配之下的既存的国际秩序的大问题。作为文明古国，中国和印度对于自身的重要性有一种担当感，尽管它们的社会仍处于极端欠发展的境

1 See John W. Garver, “The Security Dilemma in Sino-Indian Relations”, *India Review*, Vol. 1, No. 4, January 2004, pp. 9-31; see also Jonathan Holsag, “Persistent Military Security Dilemma between China and India”,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Vol. 32, No. 6, December 2009, pp. 811-840.

况。因此，对北京和新德里而言，将本国对世界的特殊主张与它们无力实现这些主张的事实相妥协，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毕竟，在之前数个世纪欧洲和西方的崛起中，中国和印度经历了一段长期的相对衰落。20世纪中叶，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弥漫着普遍的贫困，两国数目庞大的人口甚至落后到无法参与世界经济的地步。结果，因其不曾参与制定的国际规则而备受挫折的中印两国常常发现，面对其他国家强加的规则（diktat），它们或者遵奉，或者要为其挑战行为付出可观的代价。作为大国，北京和新德里现在已经具备了重塑世界的权力与责任。除非获得北京和新德里的明确支持，将来不可能有任何可持续的国际规则。这一点已经在当前关于全球变暖的国际谈判中颇为明显地体现出来了。因此，中印之间的和平共处和更深入的双边合作，乃是营造任何稳定而可持续的21世纪全球秩序的重要前提。在国际阵线，新德里和北京已经看到两国在气候变化、贸易、对国家主权问题的立场，以及反对西方国家军事干预等议题上展开合作的前景。然而，两国之间的分歧仍然在如何在亚洲建立新的安全秩序，以及在国际体系力量彻底再分配的情况下如何看待全球治理（无论是联合国安理会还是不扩散核武器体系）等方面体现出来。这些分歧反过来也影响着中印两国各自与当代大国的关系。本文接下来的部分将就某些细节考察中美印三国之间出现的动力学（dynamics）是如何运作的，它在2010年有何表现。

作为大国，北京和新德里现在已经具备了重塑世界的权力与责任。除非获得北京和新德里的明确支持，将来不可能有任何可持续的国际规则。中印之间的和平共处和更深入的双边合作，乃是营造任何稳定而可持续的21世纪全球秩序的重要前提。

三、中印美战略三角的出现

在2010年下半年，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的领导人——英国首相卡梅伦、美国总统奥巴马、法国总统萨科齐、中国国家总理温家宝和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以上述顺序对印度进行了访问。印度总理辛格（Manmohan Singh）为了参加与日本首相和欧盟领导人的峰会，也分别访问了东京和布鲁塞尔；在欧洲之行中，辛格还会见了德国总理默克尔。尽管这些访问的时机如此接近系出偶然，却也反映出诸大国对印度的新兴趣以及某种更宽泛的共同主题。[1] 在自2007年以来囊括整个发达国家世界的全球衰退中，印度经济很快就恢复了高增长率。削减商务协定，深化与印度的贸易合作，印度已经成为世界上所有领导人的重要目标。经济的迅猛增长为印度实现其长期存在的政治目标提供了新的影响力。这

1 具体分析，参见C. Raja Mohan, "Themes from India's Big Power Diplomacy", *ISAS Insight*, No. 117, Singapore: Institute for South Asian Studies, January 2011。

些目标包括为印度在以下事务中的主张博取支持：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加入全球核不扩散规制；在亚洲安全秩序构建中充当更重要的角色；以及对巴基斯坦施压，令其铲除境内的恐怖主义机器（terror machine）。在奥巴马、其他西方国家领导人以及俄罗斯总统对这些目标表示热情支持的同时，印度发现中国采取了一种模棱两可、不情不愿的态度。这部分地反映出新德里与华盛顿之间逐渐增长的热情，以及最近几年印中两国之间出现的新的紧张。然而，这两个趋势或许不可分离；它们似乎与三个国家之间更大的三角动力学紧密相联。

撇开1960年代初期美国在中印冲突中对印度的短暂偏袒，几乎没有基础去想象这三个国家之间存在着某种三角动力学。在冷战的多数时间里，对于南亚地区的权力均衡，是莫斯科、北京和新德里之间的三角动力学在发挥更显著的作用。中苏分裂，印中边境冲突，以及新德里向莫斯科示好三者之间确有深刻的相互关联，这已为195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的事实所证明。1970年代中美关系的正常化，冷战后期阶段华盛顿与北京反对莫斯科的政治合作，以及冷战后中美两国之间深化的经济和金融相互依赖，这些事实表明，印度在中美关系中被边缘化了。直到小布什执政时期（尤其是2005—2009年的第二任期），华盛顿才将印度纳入美国关于中国的战略运筹。

布什与其印度对话者都没有将两国关系定位为反对中国。将大笔政治资本投入构建与印度的新的伙伴关系的意愿，以及为促进与印度的核能贸易而修订国内不扩散法规并改变国际规则的前后矛盾的决定，显示出布什对印度有着出乎意料的热情；这一热情的动机被广泛解读为有意要利用印度制衡中国崛起。尽管没有指涉这种效果的官方声明，但正如布什政府对印政策的关键设计师之一、于2001至2003年期间担任美国驻印大使的布莱克维尔（Robert Blackwill）日后所说的，中国因素在布什政府接纳印度过程中发挥了中心作用。“布什总统任内美印关系的转型以如下核心战略原则为基础：民主的印度将成为制衡中国权力兴起的一个关键要素。但显然，这并不是基于‘遏制中国’的概念。它的中心理念毋宁是，在未来数十年里，美国和印度因其拥有许多重要资产，因而有必要促使中国采取负责任的对外政策；就此而言，美印双边的深入合作是两国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2009年5月，布莱克维尔向其印度听众如是说。他还补充道，“如果不是这近在华盛顿眼前的中国因素，布什政府将不会就民用核协定（Civil Nuclear Agreement）进行谈判，国会也不会让它通过”。[1]

如果说许多华盛顿人士，尤其那些在民主党外交政策部门的人士，将布什对印度的着迷视做不明智之举，新德里则深切地担心奥巴马会变卦（reverse the

1 Robert Blackwill, "The Future of U.S-India Relations", Address to the Confederation of Indian Industry," New Delhi, May 5, 2009, available at http://www.stratpost.com/the-future-of-us-india-relations-blackwill, accessed on January 9, 2011.

gain）。奥巴马任参议员时对美印民用核倡议的怀疑，华盛顿不扩散共同体内部对核协定的广泛反对，自由民主势力对解决印巴克什米尔争端的渴望，以及民主党政府可能将对华关系置于对印关系之上的种种迹象，这些都引起了新德里的担心。2009年11月奥巴马的北京之行证实了新德里最大的恐惧。奥巴马与胡锦涛主席关于中美共同努力维持南亚地区稳定的联合声明，强烈地激怒了新德里；在奥巴马离京数周后辛格的华盛顿访问中，这一事件位居议题之首。敏锐地感觉到印度对其被降格为相对于北京的次等地位的担心，奥巴马迅速表明印度是“不可或缺的国家”，并将其称做“亚洲的领袖”。[1]

如果说2009年11月奥巴马的中国之行引发了华盛顿对华政策的重新思考，2010年美国与中国关系的新紧张则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反思。2010年6月，美印举行战略对话，奥巴马为出席对话付出了破坏外交礼节的代价，再次确认了这一届美国政府美印战略伙伴关系的坚实承诺，从而打消了印度方面对奥巴马执政期间印美关系会发生倒退的疑惧。虽然不那么显眼却同等重要的是，华盛顿还与印度展开了关于中国和东亚的对话。2010年3月和9月，对话的前两个回合在高层官员之间展开；据两国官员称，对话取得了相当的成功，标志着美印之间就中国问题展开磋商的制度化。新德里也于2010年强烈地意识到，中国的崛起将会对印度的国家安全利益产生重大影响。这一年，中国挑战“核供应国集团”的规则，与巴基斯坦达成向其出售额外的核反应堆的交易，显示了欲与美印民用核倡议一比高下的决心。中国向查谟—克什米尔的印度公民发放另纸签证，此举被新德里视为中国对印巴争端采取中立立场的变化，是对印度对查谟—克什米尔享有主权的质疑。印度要求中国尊重攸关其领土主权的“核心国家利益”，如同它在西藏和台湾问题上对北京的顺服一样。印度看似要将西藏与克什米尔相提并论的做法，标志着两国之间长期存在的领土争议进入了一个新的时刻。[2] 正是在这一情境下，奥巴马和温家宝分别于2010年11月和12月出访新德里。

表面上看，温家宝2010年12月中旬的印度之行似乎与奥巴马及其他欧洲领导人并无二致。温家宝率领了由商界人士组成的庞大代表团，达成了比包括奥巴马在内的其他领导人更多的商贸协议。然而，温家宝访印期间，印度的中心议题是不断增大的对华贸易逆差：2010年双边贸易额为600亿美元，印度逆差接近200亿美元。中国总理承诺，将通过扩大市场准入来解决印度的需要。在政治方面，两国的分歧更加严重。温家宝承诺近期将解决另纸签证问题。在印度感兴趣

1 See Obama's remarks welcoming PM Singh at the White House, November 24, 2009, available at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remarks-president-obama-and-prime-minister-singh-india-during-arrival-ceremony, accessed on January 11, 2009.

2 Pranab Dhal Samanta, "India Equates Jammu & Kashmir with Tibet", *The Indian Express*, November 15, 2010, available at http://www.indianexpress.com/news/india-equates-jammu-&-kashmir-with-tibet/711151/, accessed on January 11, 2011.

的三个主要问题上，不难发现奥、温二人之间的不同。[1] 在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问题上，奥巴马中止了美国对印度候选资格的不情愿态度。另一方面，温家宝则仅仅表示，中国“理解”印度在联合国扮演更大角色的渴望。

在印度融入国际不扩散秩序问题上，奥巴马支持印度在短期内获得在核供应国集团、“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澳大利亚集团和“瓦森纳安排”的成员国资格。在美国国内高科技出口管制问题上，奥巴马也强调新德里作为战略伙伴的长期需要。奥巴马将一些主要的印度科研机构从管制清单上删除，并保证积极改善印度在美国出口管制法规中的地位。奥巴马的行动和承诺表明，美国愿意接受印度在全球不扩散机制中成为它的全面伙伴，承认印度作为一个事实上的核国家，并撤消所有因未签署《核不扩散条约》而加诸印度的负担。与此相对，中国仍然不情愿承认印度的核国家身份。[2] 与奥巴马及其他领导人不同，在辛格和温家宝的联合公报中，中国原本可以但却只字未提印度在核供应国集团中的成员国资格问题。总而言之，在核问题上，中国仍然以不同的眼光看待印度和巴基斯坦，倾向于在新德里和伊斯兰堡之间维持“核对等”。

在维持南亚次大陆均衡这一更宽泛的问题上，温家宝似乎强化了中国传统上对巴基斯坦的支持。然而，其他领导人则转向更明确的中立，甚至倒向印度；尽管为了实现在阿富汗的国家目标，他们当前对伊斯兰堡有所依赖。奥巴马、萨科齐和梅德韦杰夫访问孟买，悼念2008年11月在巴基斯坦境内谋划的恐怖袭击事件的死难者。与此相对，甚至在公开地谈及“11·26”事件和对这场可怕袭击中的死难者表示同情时，温家宝都表现出迟疑。没有其他领导人在印度之行中安排对巴基斯坦的访问，而温家宝决心通过访问伊斯兰堡向巴基斯坦证明，中国的承诺是持久的。当奥巴马和其他西方领导人公开呼吁巴基斯坦领袖关闭其领土上的恐怖分子避护所，及早将袭击孟买的罪犯绳之以法的时候，温家宝则仅仅限于发表关于恐怖主义的泛泛之论。

在新德里的政策制定部门以及更宽泛意义上的印度战略界，已愈发注意到以下事实：美国和西方在支持印度的核心国家安全利益——要求在台面上坐拥一席之地的雄心，作为全面和平等的伙伴融入全球不扩散秩序，以及与巴基斯坦境内的跨境恐怖主义做斗争。另一方面，中国的态度则仍然模棱两可，不愿为寻求一种更友好的中印关系而冒犯巴基斯坦。美印利益的呼应和美中战略分歧的扩大，

1 其中实质内容、语气和与要旨的差别，分别参见辛格总理与奥巴马总统和温家宝总理的共同声明。“Joint Statement of Prime Minister Manmohan Singh and President Barack Obama”, New Delhi, November 8, 2009, available at http://www.mea.gov.in/mystart.php?id=530516632, accessed on January 9, 2011; “Joint Communiqué of the Republic of India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New Delhi, December 16, 2009, available at http://www.mea.gov.in/mystart.php?id=530516879, accessed on January 9, 2011.

2 Siddharth Varadarajan, “In Statements, Gradual Recognition of India's Nuclear Status”, *The Hindu*, December 23, p. 12.

表明印度与美中两国关系的传统结构已发生重大偏离。过去在印度关注的核心问题上，美中两国倾向于采取相似立场；而新德里也因循某种逻辑，在华盛顿和北京各据一边的事件上保持不偏不倚。毋庸置疑，印美两国在许多问题上意见不合，新德里和北京之间也有很大的达成共识的基础。但这不能否认，战略上的热络已经开始塑造印度与美国的合作，印度对领土主权和国家安全的担心愈发深化，而这正是印度如何接触中国的决定性因素。

美印利益的呼应和美中战略分歧的扩大，表明印度与美中两国关系的传统结构已发生重大偏离。战略上的热络已经开始塑造印度与美国的合作，印度对领土主权和国家安全的担心愈发深化，而这正是印度如何接触中国的决定性因素。

四、战略三角的持续性

印度与美国和中国的三角动力结构在亚太地区关系中显示得最为清晰。对亚洲权力分配变动及其对地区秩序的影响的研究已经意识到，“制衡”中国崛起的需要，已经成为新德里和华盛顿之间拓展安全合作的一个重要因素。[1] 随着亚洲及相应海域愈发显著地成为华盛顿和北京的主要竞技场，美印两国各自的地区政策越走越近。在对印度国会的演说中，奥巴马不仅认可印度的“东向政策”（“Look East Policy”），还敦促其更多地“融入”该地区。奥巴马的印度之行是其出访四个亚洲民主国家（印度、印尼、韩国和日本）的一部分。此举无论在华盛顿还是在亚洲地区看来，都是美国要“重返亚洲”的表现；它标志着美国已经准备中止近年对亚洲的忽视，而且要在这备受中国崛起威胁的地区重申其主导地位。

中国的崛起也影响了印度的亚洲政策。对于接纳美俄两国的东亚峰会（EAS）的扩大，辛格在其与奥巴马和梅德韦杰夫的联合声明中表示欢迎，并强调维持一个“开放而包容”的地区架构的重要性。尽管印度和美国在“阿富汗—巴基斯坦”问题和中东事务上存在许多分歧，亚洲地区的进展情况或会为某种新的联系提供基础。正如印度国家安全顾问梅农（Shivshankar Menon）所评论的，“传统上印度和美国彼此隔着欧亚大陆和大西洋打量对方。如果将视线转到太平洋这一为双方所共享的、攸关两国安全与繁荣的空间，我们将看到不同的景象”。[2] 除了扩展与美国在防务与安全上的合作，新德里也着手对日本、澳大利亚和这一区域内的某些东盟国家开展类似的合作。新德里经常组织其伙伴进行多边海上行动，而且愿意加入集结于民主名下的特定集团。

新德里和华盛顿彼此在逐渐靠近，但确实也有人对两国与中国的三角动力

1 例如，参见Malcolm Cook, Raoul Heninrichs, Rory Medclaf and Andrew Shearer, *Power and Choice: Asian Security Futures*, Sydney: Lowy Institute, 2010.

2 2010年9月30日在华盛顿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发表的评论，参见http://carnegieendowment.org/files/Ambassador_Menon's_Speech.pdf, accessed on January 10, 2011。

学的持久性相当怀疑。尽管新德里和华盛顿都对中国权力的兴起表示担心，两国都没有公开宣示某种制衡后者的政策，更不要说那些旨在遏制它的政策了。在新德里，对于美国与印度建立真诚的伙伴关系的承诺，许多人仍然深感怀疑。美中之间的深度经济相互依赖以及印中经济合作的增长，确实为两国反对北京的战略运筹设置了严重的限制。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为了限制北京支配亚洲的潜在可能，加强双边防务合作的步伐该走多远？对于这些问题，两个国家内部都形成了明显的政治分化。两国权势集团的审慎促使新德里和华盛顿努力改善其与北京的关系。经过充满公开敌意的一年，奥巴马政府2011年1月底在华盛顿接待胡锦涛时，双方都展示了扩展和加强双边伙伴关系的决心。许多人将建立与北京的合作关系视为美国最优先的国家利益。[1] 在2010年12月对温家宝来访的仓促接待中，印度希望阻止近期双边关系的走低。新德里强烈地意识到自己作为三国之中的最弱者，很容易在华盛顿和北京的双边关系转化中遭受损害。印度也很清楚，面对两个亚洲巨人，处于相对衰落之中的美国可能会为北京腾出空间，以规避制衡（遏论遏制）中国的负担。印度也意识到，中美之间的联系无论在深度还是广度上都甚于新德里与北京或华盛顿之间的联系。

印度也意识到，中美之间的联系无论在深度还是广度上都甚于新德里与北京或华盛顿之间的联系。

中国方面则密切关注奥巴马政府“重返亚洲”的政策。它已注意到美国与印度之间共享着某种政治价值，提醒新德里不要试图以民主的名义建立某种联盟。“‘最大的民主国家’这一头衔，看似印度和西方同斟共酌的一杯美酒，然而它并没有给印度的国家利益带来任何实质性的好处。面对庞大的人口和经济发展进程中许多有待完成的工作，印度或许不会因为过度沉醉而在中国面前高调行事；对这种高调更乐见其成的是西方而不是印度”。[2] 尽管美国与印度之间的战略权力游戏玩得很真切，但尚不足以削弱中国在美国战略运筹的中心地位；对此，一些中国的分析家们满怀信心。“表面上看，美印两国的二重唱互相呼应；然而，断言奥巴马政府将会比其前任（如小布什政府）更好、更实在地满足印度的期望还为时过早。那些认为奥巴马匆忙的印度之行证明了美国已经将其战略聚焦从北京转向新德里的观

尽管美国与印度之间的战略权力游戏玩得很真切，但尚不足以削弱中国在美国战略运筹的中心地位。

1 Zbigneiw Brzezinski, "How to Stay Friends with China",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 2011, available at http://www.nytimes.com/2011/01/03/opinion/03brzezinski.html, accessed on January 10, 2011.

2 See "Who Wins the Dragon-elephant Contention", editorial in the *Global Times*, December 16, 2010, available at http://opinion.globaltimes.cn/editorial/2010-12/602061.html, accessed on January 10, 2011.

点是荒诞的。”[1]

中国的分析家们似乎对当前新德里、华盛顿和北京的三角动力学的状态做出了现实的评估。然而，中国弥合其与美印两国渐趋显著的结构分歧的能力还尚未确定。但这并不否认，几年前印度在中美关系中无关紧要的地位，如今已需要重新认识；近期内，它的分量将取决于中国在亚洲采取强势政策的程度。在对中国的崛起两面下注时，新德里和华盛顿的空前接近已经出乎多数印美关系观察者的意料。相较于小布什时期抽象的提议，印度已在美国的亚洲战略中获得了更突出的地位。随着中国的崛起对印度的核心利益造成影响，新德里对其亚洲政策的阐释会变得更加微妙。印美关系最近的动向表明，新德里和华盛顿不太可能成为传统意义上的盟国：印度是如此庞大的国家，重视本国的战略自主；而美国尚未习惯在平等的基础上与他国建立伙伴关系。尽管如此，倘若中国的亚洲政策被视为强势而咄咄逼人，新德里和华盛顿就会迫于某种压力而深化彼此的地区合作。倘若未来中国能够接纳印度，并且愿意接受后者的某些核心国家利益，那将会显著降低新德里与华盛顿协同亚洲政策的动机。

（邓好雨　译；于铁军　校）

1 Li Hongmei, "Obama Greets India With More Than a Lip Service?" *People's Daily Online*, November 9, 2010, available at http://english.peopledaily.com.cn/90002/96417/7193497.html, accessed on January 10, 2011.